

已編索引

當代評論

第一卷 第十六期

一週時事評述

學術與政治

軍·商與士

漢代的農民

詩言學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性

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

賀麟

張德昌

孫毓棠

王了一

袁方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中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北平圖書公司

一週時事評述

關於江和湖北的勝利，我軍於國慶三十週年紀念日又有鄂西的小勝。

在短促的五星期中，我軍共收復三個鉅大的戰果。今年我們實為勝利年，有了這三次勝利，我們勝利的基礎已定可以不負這個勝利年的名稱。只要將來適當機會到來，我們必能以長沙會戰的精神去發動反攻，我們必能依照福州和宜昌的實例，而收復一切失土。此次我軍於十日上午三時十分克復宜昌城，其後雖于十三日再度退出，但在軍事方面已具有重大意義。第一，宜昌失陷已久，敵人在宜昌已築有甚堅固的工事，且宜昌三面臨江，在敵人海軍保護之下，頗甚難攻。這次我軍竟能以神速的攻勢，一舉而下。其後雖再度退出，但已足證明我軍愈戰愈強，而敵軍的戰鬥能力已顯減退。第二，敵人雖一再宣稱要南進北進，但我們深信敵人的主要目的還在「解決中國事件」。所以敵人的目光無時不集中於我國的戰時首都。如果可能，則敵人是願南進或西進的。進攻重慶的河漢路線有三：一是沿江江陵三峽而西上；一是入漢中而南下巴蜀；一是由南路貴州一帶北上。敵人在南竄撤退後，第三條路已不可謂。至於第二條路，則路線過遠，且我們在陝西一帶駐有精銳部隊，我們也極有把握。因此有些人的推測，以為無論在表面上三峽如何險要，沿江西上仍為進攻重慶最簡單的路線。因此在上次宜昌失守時各方曾有過若干心理的震動。現在宜昌既被一度克復，就可以充分證明第一條路我軍力量之堅強，敵人是絕走不通的。因此宜昌的一度克復，可以告訴我們敵人是無法接近重慶的。只要重要商埠安全，則敵人便永無取勝勝利的可能。(啓)

行政院第五三四次會議，通過關於縣參政的各項條例外，並議決擬訂設立縣各級民意機關之步驟，其步驟大致如下：(一)各省實施新縣

二年以上的縣份，如省政府認為可以成立縣參議會時，得呈准行政院成立。

(二)其未實施新縣制及未成立縣參議會之縣份，即由縣行政會議暫行代其職權。這是權宜的辦法，我們無可非議。自「縣參議會組織法」公布後，各省即開始準備，俾得如期成立；但是許多省份，或因情形特殊，或因備不及，未能遵令辦理。這是我們深引為憾的事。然而，近來仍有人對於縣參議會的設置，發生了很大疑義，以為在此抗戰時期，遍設民意機關，不但有礙事權集中，且會惹起意外紛糾。我們看法都不盡如此。戰時期不必添設勞務機關，但絕對不可缺少溝通人民與政府的民意機關。且在現今地方行政上，許多有關抗戰的政務，必須由各縣機關推行，而縣參議會適於此時設置，其作用是很顯著的。不過在抗戰時期，政制改革實有彈性，每每因時因地，而定其取捨，不必求其一律。此次行政院所決定設立民意機關之步驟，就是符合這個宗旨的一種措施。(章)

近

月各地的物價又作急激的變動。在七月間，因為本年上半年底各地物價平穩下來，大家對物價問題逐漸表示樂觀。當時我們在本刊第四期中，便發出警告。我們說：「物價所以逐漸平穩下來，完全是因生產漸有改進和內運物資日有增加所致，完全是自然的(而非人為的)結果。……正當這種物價的穩定是自然的結果，所以我們不能對這個問題過份樂觀。將來如供求的內素發生變動，誰能担保我們的物價不會再發生急激的變動？」不幸我們的警告並沒有被注意到。政府在過去二、三個月並沒有任何進一步加強物價統制的措施。結果最近物價的再度騷動又引起各方的不安。蔣委員長於九月底手令行政院經濟會議擬具平抑物價的具體辦法。我們認為各方的不安和高當局對物價的關心都是應有的現象。物價問題確實對去年下半年的情況，已對十分嚴重的局面。當時早就應該集中全力去解決這個問題。在行政院經濟會議初成立時，大家對這個新機構的期望甚殷。幸這個機構成立以後，始終沒

許多大的物價，其價值更便宜。現在物價再度上漲，主持物價統制事宜的人實不能不負其責任。但「亡羊補牢」，未嘗晚也。只望當局能急起直追，則事情仍不至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們認為今後努力的方法應從兩點：一是減輕通貨膨脹的程度，二是實施全面的物價統制。通貨膨脹的增加，如沒有辦法使之停止，則物價統制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政府如能先在通貨方面有一妥善的安排，則物價問題已減輕一半。但除在通貨方面採取合理的措施外，政府仍應實施全面的物價統制。統制所以必要全面，是因為物價問題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的，任何分割片面的統制都無法奏效。近來重慶方面流行着種種奇異的理論，一是物價領導物價論，二是物價引導物價論，二者都是一種不通。各種物價是互相影響，互相制衡的。例如，上半年，則糧價的增加超過其他物價，而近月來則其他物價的高度又超過糧價。因此政府在統制物價方面絕不能偏重於任何一方面。必要全面統制，才有成功的希望。(啓)

美 國軍事代表團，已經抵達，它們的目的，是在求取最有效的方式，以當與英國飛機軍火租借法所給予中國的援助。我國應派副團長馬格魯德少將及代表團全體熱烈歡迎。爲實現國際間民主理想而共同努力，民主國家的人民，不乏先例，英國詩人喬叟曾爲希臘獨立而捐軀，法國貴族萊蒙德曾投軍拿破崙將軍麾下，今日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將來同樣地要成爲歷史上的佳話。我們希望世界民主兵工廠，供給我們大批飛機與其他利器，我們更需軍火及彈藥，美國已請宣布供給中國價值一萬萬三千萬美元的飛機，明年秋季交貨，更擬定發展中國內地兵工廠的計劃。時間是勝利的要素，如何迅速供給我們迫切的需要，是美國軍事代表團應加注意的任務。(恭)

英 遠東軍總司令波普頓馬尼尼後，現續與菲島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前後三日之久，參與者有美國遠東軍事代表團長馬格魯德少將及菲島文治軍事顧問奧斯頓納，總統秘書特倫特、菲軍參謀長勃蘭斯。

軍、部長佛蘭西爾哥等。席間討論遠東防務各問題，並一級人士對此。此次馬尼利會議至爲重視，蓋美英在遠東已締結軍事互助協定，官方雖仍否認，但兩國關於遠東防務問題此後必愈趨密切，毫無疑問。遠東各民主國間的聯合反侵略陣線從此愈趨鞏固，實於投機動搖的倭寇當不無所顧慮，無怪倭報認爲馬尼利會議之目的在使倭寇整伏而備備不安也。(迅)

倭 內閣情報局宣佈，日本根據日越經濟協定，爲實行初步經濟提提提見，決定派遣經濟調查團赴越，內定前駐西班牙大使橫田正幸以團長另選，各部門代表及民間專門人才充團員云。日寇自侵入越南後，在越南出不窮，軍事、政治及經濟侵略多方並進，試觀今日之越南，究係誰家之天下？屈服之前車可鑒，對倭外交可不慎歟！(迅)

美日談話雖早已停頓，且尚未陷於破裂。本駐美大使館公使若杉聞已於八日返抵華盛頓，傳播有日政府之新訓令，據一般預料，美日兩國間或有新商談話。但按我們推測，美國政策在過去幾年中，早已表示得很明白。現在德國對蘇聯稍趨順利，日本國內的加人及急進份子氣憤愈高，德國又派大批有力份子赴日活動，如欲日本務能離心，放棄反侵略政策，決不可能。所以我們相信美日兩國即使繼續談判，徒然遷延時日而已。自德蘇現在維持現狀的情形下，美日談判終局尚難確定，以緩和與美國的關係封鎖計劃。但倘若觀火的美國當局諒決不會受倭誘騙的。(迅)

近來報端傳，美國將修改中立法，俾使商輪得以武裝，因此一般便斷言德已向參戰之途邁進；但是因爲美國的動作，素未很遲慢，所以其人說他祇管口噴而不動手。其實，這都是不切實情的批評，美國政治的特點，是政府隨時受輿論牽掣，尤其對外的最重要措施，必須先得輿論支持，才敢放膽進行。但美國是地廣人眾的民主國家，那裏輿論的方向，頗難逆測，往往非經過相當時間，不會凝結而趨顯明。不過輿論在美國，却可比川流一般，其初期是一盞一滴累積起來，隨着地勢而易其動向，最後必形成不可阻遏

的耳。獨立主義支配了美國輿論許多年，直到現在始為國際環境所驅逐。由於對國際環境的深切認識，輿論與輿論已漸漸產生了。試觀最近拉瑟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人民贊成參戰者，佔百分之五十六，反對者佔百分之三十六，無意見者佔百分之十。美國輿論的轉移，於此可以想見。況且美國的政治領袖，在戰前如羅斯福，在戰時如威爾遜，都曾在輿論的引領下。他們每次對全國作援助反侵略的呼籲，從來沒有不提到作戰的目的，其用意是使給予輿論以啓迪。美國人在反侵略立場上，到今供知其當前的急務，是擊敗希特勒，使軸心全部坍塌，但同時他們亦已認清其所應負的責任。絕不以此為限。威爾遜在七月，曾與否已不復引起熱烈的爭辯，一旦時機成熟了，美國人必不惜與軸心一戰。從最近修正版中止中立法運動中，我們可以窺見，美國人在心理上已準備作戰了。(章)

學術與政治

(一)

一般對學術，我們必須先承認，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主權，牠有她的大憲大法，牠有她神聖的使命，牠有她特殊的廣大的範圍和領域，加入不能侵犯。每一門學術都有每一門學術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一些人，一個個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於其職，實以心血，以保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性命，亦所不惜。因為一個學者爭取學術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使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經濟的產物，那麼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因為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現。牠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牠是獨立的，不是依賴的。牠的自由獨立，是許多精神產物與不具的學術界的先驅，竭力奮

鬥。德蘇戰爭，則正轉入極嚴重階段，希特勒動員三百萬人，進攻莫斯科，中路包圍，雖略有進展，但德軍尚未獲得德方所誇耀的勝利，蘇聯軍事方面，德方宣傳現已包圍蘇聯軍師的全部軍隊，此說至不足信，蘇聯軍方稱，德方大舉進犯，已為蘇聯軍所阻擊，亦未免言之過早，今後發展如何，當為德蘇戰爭的決定時期。假如希特勒集中全力，孤注一擲，與蘇聯軍隊的抵抗力，到最後時期，恐怕要遭拿破崙進攻莫斯科的惡運，即使極高現代化的日耳曼陸軍，遠非十九世紀軍隊可比，但是蘇聯焦土抗戰的威脅，現在依然可以發生有利的效果，德軍的進展，無疑地要受到阻礙，倘使希特勒付出極大的代價，佔領莫斯科，蘇聯亦必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其對德蘇的物資援助，只有繼續增加，納粹的侵略，當不能得到決定的勝利。(卷)

賈

門爭取得來的。其案。學術失掉了獨立自由就等於學術喪失了牠的本質和神聖的大神聖使命。

同時在某種意義之下，政治也是獨立自由的，牠也有她特殊的領域，神聖的使命，牠有她特殊的使命，記別學術，也應當忠貞不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英雄豪傑之士來爭取保持牠的獨立自由。政治沒有獨立自由，便根本不能維持。政治，這詞在社會學上，教育，外交，軍事，一切活動。

學術事業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擔當的，政治事業也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勝任的，學術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是政治的人，不一定長於學術，同樣長於學術的人，也不一定長於政治。許多專門學者，學問既很專，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會有偉大的表現。有時甚至於「問政好，而政治能少愈好的人，因為知與行，知與知人，知學與

清華，雖不能面面俱到，但究有不同，需要兩套不同的本領。大略上說，須得分工合作，而不易求健全之才的。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主張哲學家作國王，如果他的意思是說偉大的政治家必須是有科學哲學的陶冶的奇才，固不失為很有深意的說法，如果誤解他這事說，以為最好的學問家，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那末在實際上政治恐不免貽誤於蒼生迂闊之見，而理論上，也就忽略了學術與政治各有其獨立自主的範圍了。

(二)

學術與政治的獨立自由，政治在政治的範圍上，兩者彼此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又有一種密切的聯繫，產生了這「學術與政治」的聯繫。

通常一個上了軌道自由獨立的政府，一定會尊重學術的自由獨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學術也一定會培植獨立自由的人格，幫助建樹獨立自由的政治。因為學術是政治的根源，政治的源泉。一個好的學術，無不以此為根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輕蔑抹煞學術，那麼，一個政府就漸漸會成爲「不學無術」，「上無遺授，下無法守」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會塌台了。

由此可見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也可以說是一體「用」的關係。學術是一體「用」學術不能夠推動政治，學術就無「用」，政治不能夠培養學術政治就無「體」。我們說學術推動政治，並不是說單是學術界少數增養學術政治就無「體」。我們說學術推動政治，並不是說單是學術界少數學者教授先生們，就可以擔任這一個偉大的工作，我們的意見是說，學術的空氣，學術的陶冶必須普遍於所有政治工作人員的生活之中，就是說每一個政治工作人員都會受過學術的洗禮，並且繼續不斷地以求學術的態度、精神從事政治，以求學術的增加、人格的擴大。政治是學術理想在社會人生活的應用，組織，和實現，也可以說，政治是學術的由知而行，由理想而事實，由小規模而大規模，由少數人的探討研究到大多數人的身體力行。政治沒有學術作骨幹，就是沒有靈魂的軀殼，雖然沒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數人支撐空虛的玩物。

因此這層關係我們可以說，任何建國運動，最後必都是學術建國運動，學術與政治同，則國家無異也。學術是建國家的鐵筋水泥，政治是建國家的「政治」或建國家所提倡的「體治」。「體治」本質

上說應當是一種「學治」，「開明的治」就是「學治」的治。離開學術而講政治就是急功好利發民以遷的申韓之術；離開學術而談政治，就是東顧西望不近人情不識時務的迂腐之見。離開學術而談政治，就是粉飾太平虛有其表無實質的繁文縟節與典章制度。

學術既然成爲政治的命脈所以中國學者有所謂，「學術」或「道統」和「政統」或「治統」的分別。參看王岐山讀通鑑論卷十三。各人貢獻其孤忠以維護他自己所隸屬的「統紀」。當時二者不可得兼，深思憂時之士，寧肯捨棄「政統」的統紀，以求「學統」的「道統」的不墜。譬如孔子受命也未曾不想作一番武王周公的政治事業，然而時勢非，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以維護學術道統的責任。一素王的工作。程學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真正的意思是說，「一姓的興亡或治統的興亡，食一朝一姓之俸祿的當政者的責任，而有關天下興亡，亦即學術道統的興亡，人人都有責任。他這種思想，當明朝滅亡，清人入主中原的時候，特別有其苦心與用意。王船山說：「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也。學也。……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靈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于一人。」（見讀通鑑論卷九，下同。）是見在一變政治改革盛衰在於在種族復興與沒有希望的時候，真正的學者，還要苦心孤詣，負責維護道統學術的責任，所以王船山又說：「當天下紛紛，人心離散之日，負延續道統學術的使命就屬「獨攝天樞，以爭制復」的偉業。從道統學術的重要，及其與政統的關係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政府尊重學術，就是培養國家的元氣，學者自己負責，就是小之尊重個人的人格，大之培養天下的人才。

(三)

學術之獨立自由，不僅是學術的獨立自由，亦且使政治成爲政治。因爲沒有獨立自由的學術來支持政治，政治亦必陷於衰頹枯朽，不成其爲政治了。所以爭取學術的獨立自由不惟是學者的責任，而尊重學術的獨立自由，亦即政治家的責任了。一個尊重學術的獨立自由，有時誠實地身自好，避免與政治發生關係，特別避免爲政治主所利用，而陷于愚昧。蔡君地命運。故有時學者必須超脫出政治方能保持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但須知獨立自

山和一般那一根是兩回事。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可，求學術和政治根本說此不可。學術和政治，但須彼此獨立自由，這須此等分工合作。就好像許多獨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個健全的近代社會。假如學術和政治脫了節，就好像原始時代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不能收分工合作團結一致的效果。這樣，決不能產生近代的學術，也不能產生近代的政治。

學術界常常有一些人，逃避政治，眼政治為危險，視政治為汚濁，惟恐政治防礙了學術的清高。這種態度足以使學術無法貢獻於政治，政治不能得學術的補益。因而政治愈陷於腐敗，學術愈趨於枯寂。這種與政治絕緣的學術，在過去的中國，頗佔勢力。如像乾嘉時代的考據，不過是世世的點綴，南北朝的玄談，也不過是末世學人的麻醉劑。無補於治道，也無補於世道。這種學術，表面上好像是超政治而自由獨立，實際上並沒有達到真正自由獨立的地步。真正的學術自由獨立，應當是一體而不可分，但而不混。學術到了這一種程度，就能夠影響支配政治社會，不怕政治社會玷污了他的高潔。假如我們奉著神玄談為學術獨立自由的主果，那麼，真正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就太遠了。最奇怪的就是有許多，他們所操的學術，儘管與政治絕緣，與社會民生兩不相干，然而他們的生活，却並不與政治絕緣。他們為爭權奪利的功名之念所驅使，一樣也可以憑人私智和申韓之術，去作不擇手段的政治活動。反之，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他們是真正的人，他們的學術維繫政治的命脈，民族的興衰，然而他們的生活却超於政治，高潔無瑕的。

學者維持學術的尊嚴，須在學問上努力；而不在于任事辭職的性情，抱虛隱的態度。韓愈政治，笑儒王侯，本來是文人習氣。許多人都誤以為這種習氣，就是維持學術尊嚴的正當途徑，我是不。說學術本身的價值不如政治，我也不是說學者會做神聖的位命，這世間俗物造詣，沒。是神說一切顯微王侯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學者少而七絕不可顯露出笑傲王侯韓愈政治的虛顯態度，因為這只是表示辭職任事等，酸腐的意味。文人的虛顯態度，而不足以代表純正的學者態度。如像陶淵明，不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普通都引為韓愈政治的美談。其實陶淵明辭官歸田另有他的苦衷。那時他看見晉室將亡，劉裕將篡，他不願當作一臣，他實有一不可仕，不忍仕之苦衷，而並沒有根本輕蔑政治助文人傲氣之意。這是採取王船山獨到的看法，見讀過陶淵明卷十九。

一王右丞詩「古人非傲吏，自關經時務」。足見中國正統的大詩人，深知各人的志趣能力各有不同，詩人天才與政治家才有別，自己解釋自己對於政治，並沒有取虛隱輕蔑的態度。又如像陶淵明，不卑小官，然而這並不損壞他「胸懷洒落，光風霽月」的高潔風度。

輕蔑政治的文人習氣，既然為詩人高士所不取，所以現代的人更不能學取這種態度，作為保持學術自由獨立的護身符。而且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更壞。政府措施如有失當，你儘可批評，食更可以行你加以攻擊奸賊的罪惡，你不妨去揭穿，你均不失為一個正直勇敢公民。現在那些有輕蔑政治習氣的人，對於一般從事政治的人，酸刺薄，嘲笑諷諷，而對於貪官污吏更巨奸大惡，反而取嘲諷諷刺的態度。像這樣對於學術前途，國家的前途，恐怕兩皆有損害。我們應該求學術自由獨立的傳統風氣，學術上是不健康的空氣。在政治上，也不易走上近代民主政治的進路。

好在自從紅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大學教育方面，總算稍稍培植了一點近代學術自由獨立的基础。一般學友，知道求學不是作官的手段，學術有學自身的使命與尊嚴。為學術有了獨立自由的自覺，對於中國改革，也產生良好影響。在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學術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學術自由獨立的立場。反對當時污濁的政治，反對當時賣國政府，不與舊官僚合作不與舊軍閥妥協。因此學術界多少保留了一片乾淨土。影響許多前進青年的思想，培養國家文化上一顆命脈。學術界這種獨立自由的態度，可以說是為北洋軍閥的殘暴，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們不能夠藉政治力的將進份子，去支持陳腐腐敗的局面，間接助於國民革命。北伐的成功。此後政治雖然有不少紛亂，學術的自由獨立，仍然保持相當的水準。但是學術界的人士，對於統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國民政府，態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脫、不理會。學術界當時普遍的現象，到了七七事變，抗戰建國的國難確定以後，學術界的人士，也就進而對政府採取盡量輔助貢獻的態度，政府對於學術界也取諮詢尊重態度，我們可以說現在我們中國已漸漸有自由獨立的政府，來尊重自由獨立學術。同時也漸漸有自由獨立學術，來貢獻於自由獨立的政府了。

軍商與士

張德昌

社會上的人，無論依照那一種標準都可以分列爲若干類別，每一類別之中又可再區分爲多少等級，同爲工人，有高級的，有低級的，同爲學生，有開明者，有愚人是所謂「白領階級」階級，有一些即非，中「過去一般的分法，是所謂士農工商，似乎是說社會上的人不外爲士，則必爲農工商之一種，如果非士，非農，非工，非商，「！實際上這種不但有，而且不少！則爲不入流不入流，不能列爲四民之一，在社會上是一個不甚冠冕的台銜。本寫稿者，我們也可以把當今這字語一分成幾種。分法的標準因看法見解之不同，自有種種，不過我們以爲「！這看法有一種好處，可以把外統很繁雜的事情簡單化了，幫助我們接近真理，瞭解事實之實況。

我們以爲在當代列國中，可以舉出三種風格迥然的典範來。第一種典範是第三種呢？一爲英美之民主國或民治國。一爲德國之聯邦制。一爲東方中國之文治國。如果我們肯看到事情的骨子裏去，同時又肯把骨子看到的真象揭示於人，則我們可改爲一個更親切易於瞭解的名辭：民主國即商業國，極權國即軍國，而文治國即士國。這三種典型都是長久歷史的產物，「！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欲更改學習亦非隔夜所能收效。這三種典型代表：「！如果我們選擇用文化，文明這等廣泛的名辭「！三種迥然不同的精神，三種不同的社會紀律，三種不同的治事態度。精神，紀律，態度是源是本，議會制度，計劃管理，以及諸事不認真，敷衍塞責是外殼。由一國國家改爲另一種國家，並不要改換環境，改良血統等如少數人之所說這樣艱難。不過也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改名換目這樣輕而易舉舉例來說，抗戰以來，政府爲急起直追，人民切望勝利之早臨，百事諸多改革。在以前更數十年才能舉動的，幾平朝夕可成。在後幾種困苦的環境中變成了溝通國際的幹道，在敵人毫無人道防備之下，努力興建新式的工商業，所有這些都是突進，都顯得自慰自勉。然而也有人說這的政府請求效率，有人建議經營事業之應商業化，還有人會提倡勞務供輸的集體農場農業機械化。在批評者是一番爲國民的善意，這套局亦曾聽聽民意，但是我們當記得許多事情不唯口拿數字來列

公司即可收效。若是不儘獲某一種的精神，紀律和態度，而求能收獲更始之

很有一部分人，以國心重，把中外情形同等比較，有時以爲我們的交通尚有待改進，以爲我們的各種機關管理或須更進一步，他們在談話時，心裏是以商業國的效率、軍事國的成績爲腹稿而有所見，但是他們忽略了立國之異，到軍事國家指陳自由權利之得失，到商業國裏唱統制管理管訓，人皆知其不宜。在文治國裏苛求商業國的效率、軍事國的組織，其宜未幾走就變態，亦屬顯豁。這樣，我們就永遠爲士國，而不能學別人的長處了嗎？不是的。欲學人之長技，必從本源開始，源清末矣，中國國勢危殆，士大夫恃西法火藥之妙，公事上書，爭言機械、機器之利，多少人唱鑼鼓製造局、開船廠，在短時期內把洋入之一套設備搬來，他們未嘗有洋人之文物精神，社會習慣如造此工藝品，只有洋人會指出國人辭章措帖，八股小楷爲進步的阻礙。可憐的人地。該於外國的現狀，把中國和西洋列強放在同一水平線上指點評論，固可激醒國人，迎頭去趕，但我們必須明瞭立國之異可謂道遠。

茲先言商國。

商國和軍國不同，與士國尤殊。

西洋社會中古之後有一大轉變。十六世紀以來，交通進步，貨幣增加，商業未發達，把舊社會慢慢的改造出一個新形態來。我們知能自古以來，政治經濟從未分家。社會上最擁有財富的人居長於治人，役人的地位。在商業未達的時候，有土有人斯有財，有財斯有勢，君主，都侯以及顯天人之際，教士都厚置良田，所以他們有地位，有特權，當時工商業者是負責族主徵吃飯的小販和藝之。雖非農奴，却是平民(Demos)。中古以後，商業漸漸發達貨幣流通廣，昔之無恆產者今可應酬萬串，於是社會重新起了分配。以前因爲無土地即無地位無特權，現在有財富，便要翻過身來，平民議會慢慢的從國王手裏把特權治權拿過來，打仗要問他們意見，議和要經他們同意，甚至國王貴族家用也要由他們規定。大體小事都拿手裏了，結果國王僅成了一塊橡皮圖章(only rubber stamp. s. B. C. The sp. y. cart.

中國「平民」這反成功之後，治事成績並不壞，諸事集思廣益，並不如一人專斷來得差。雖然一般人還不免笑他們腳上的灰土，譏之為無一勇血一傳統的「平民」，但他們能把國家治得如新境，商號一樣。他們地位增高了，手上的奧味未去習慣未改。從前是管小賬房，現在司國家財政，是管大賬房。一切都用原來的精神來處理。議會是以前商會，委員會是以前夥計的聚會。商人們聽不了算盤，一年開頭要有個預算，年終又要結算一下。把這個制度應用到國家，於是乎有預算決算。既然倒處不脫老的商人習氣，以治私精神來治公，所以公營事業無法不商業化。事實上在商人治下的國家裏，國事商業化了，商業也成了國事。國事商事有時很難劃分。乾隆六十大壽時，奕使請求鑄商，乾隆批示其國王大意謂國君而為商人爭利，認為有失體統。因為我們治者不是商人，不是夥計出身而是文士。在商業國裏，雖然也有職員，也有部長，然而商賈之氣味彌溢各地。當然在商業，也有工，也有兵，也有士，而且也有他們各自的地位。不過在這種國家裏，領導精神是商人的精神。社會紀律是商界的紀律，商人習慣，商人態度支配一切，這是商國。對以往之君權神權而言，是民治國成民主國。

商國之出現是數百年演變之果。十九世紀以來，商國的英國聲震天下。四洲都有英國商船，各地都有英國工產品。發號大呢呢製造，堅甲利刃也遍地。許多人羨慕英國之兵輪砲艇，於是市購買而置械設廠，欲為英國人之所能為，後來有人更進一步看到議會制度及選舉，英國的文物就都搬過來。在謀利社會中大興土木都趨有利可圖，於是大的商會組織好了，議員也湊齊了不料這些人除了在開會時飛飛墨墨，對口為之，在場外寫社評之外，似乎並不能有所建樹。又過數十年，許多人又看到商國之公營事業之有成績，勝過官辦官營，於是昔之所謂都會衙門，搖身一變而改為公司商行，但是我們不時聽到商業化的呼聲，可見尚未真正做到商業化的地步。然則其故安在？是學習不易呢？還是制度本身有可議。我們以為最大的感結在士的精神，而治商業之事。在商國裏，自紡織以至兵工，都是商人精神之表現。都是商界紀律的呈露，無商人之精神，無商界之紀律，而欲求商人治事之效果，正同聽了話會商之後，不能學得議會制度之真諦一樣。

自古以來就有戰爭，但軍人之威，專門階級則為近代時期之事。西洋有過領師的文高，有過財富權國的呂不韋，名將異勿論。但是漢代以降，

在以前專門學打仗的人不多，實由於農。時勢使之然。自有此種變化，其以後，兵不知耕，農不習兵。於是軍人之重要性質。魯士的軍人是其特殊歷史的。遠在中古時代，有過幾次大移民運動日讓曼人向東普魯士遷移，在當地有原普魯斯拉夫，慢慢的普魯士的移民者佔據地主治人的地位。佃戶們成了聽命者。治者習武治兵，世世仿習有了軍人的傳統。軍人對於事情別有一種看法，有一種籌算。軍人有一種特殊的精神，重紀律、嚴組織，治軍如此，治國亦如治軍，在一個商業國家裏，人口多寡被看為製造力的大小，在一個軍國裏人口之多寡就被看做兵額的多少，商人要擴充商品流通的區域，除國界的障礙，軍人則要鞏固國防保守國界，立場不同，觀點自異。十九世紀大德意志國統一，普魯士軍人精神擴大充溢於大德國，德意志帝制成了普魯士的擴方化身。於是得到變為典型的軍國。築路修河在英國商業國裏，是私人的事情，是計利得而與商爭，公認為商運，運河為商運，鐵路為商運，但是軍國的清國，這路不分水陸都被看做軍運幹線，軍事價值高於一切。

十八世紀以來民食在英國是商業政策之一環，他們在算盤上計算如何以呢呢噠噠去換取南美的牛肉，東方的茶葉，美俄澳加的麵粉，樂得不自己種。農人早被人遺忘了。在軍國的德國則足食足兵為軍略之一，又其一環，在這種國家裏，領導的精神是軍人的精神，社會以紀律治軍事的紀律。在軍人國之中，外交有戰爭，商業也有戰爭。和平僅是備戰之間隙，平時是養兵之日，戰爭是用兵之年。

第二次大戰後，到現在又數十年了，朝代鼎革，入將出相，兵會雲合發生，多少大事，添了多少新名辭，增加了多少新口號，而原有之精神未變：英國人還是在算盤上計得失，德國人還是在刀劍上逞威風。保存民主制度就是保存商人精神，紀律支配的世界，管理，統制，計劃經濟就是軍國主義的變名，是戰爭經濟。

一個國家該當當代列強之盛，要有商人的治事效率，又要有軍國的威力，必須先求獲得商人與軍人的精神與紀律。這兩者不可得兼，而改頭換面，必一無所成則甚顯。

中國古史，春秋以前尚矣。春秋戰國以來有過貨值列傳上的巨富大賈，有過領師的文高，有過財富權國的呂不韋，名將異勿論。但是漢代以降，

士治國，軍人居次，而商人祇得青年行酒。成爲文士之天下。士不習商業，獨立運動，不習武事，祇以開墾之事。不必出自富室，但現有大批「所說與身才」依其爲生，士心儲存身致用，難免常委屈，所以屢講中庸。雖必，自古至今，認真，嗜賭之士，代有其人，但是一端分既無商人之計算精神，又無軍人之氣魄。把這些人分佈於機關中、地畝中，分利到公理，局，會，委司這地是穩妥，穩妥可改爲公司，那得可更爲妥當，但士之精，常存，如星我們要求得到商人的執事，我們當從訓練士，改變士的精神起，如果我們

漢代的農民

戰國時期土地的分配比較平均，經秦代到漢初一百年間，農情情形並沒有什麼變遷，社會中大多數的農民還是小自耕農。這般小自耕農大抵一家四五口人，耕種自己所有的一百畝左右的田地，另外有幾畝菜園，種些蔬菜，木，總宅種幾株桑樹，帶些家畜。這一百畝田地，在當時農業社會的習慣上，無形中成了一個單位。古稱「一夫」，後稱「一廛」，仍保留着「一夫一田」時代一夫一田百畝的遺痕。這一頃田的財產與收穫僅足以支持一個五口之家的小家庭的生活。譬如揚州，住在帳山之陽，有田一廛，僅够一家餬口，別無餘利。如平家裏只有三十畝田，與兄嫂共居，便不易生活了。在漢代農業社會裏，這般小自耕農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支柱，因爲他們是主要的生產者與勞動者，在他們之上，有一些的地主，在漢初百年間雖已漸漸顯赫，但總數目還不太多，勢力也不大。他們之下，有一些自己沒有土地而租耕地主土地的佃戶，還有一些「費庸而耕」的雇傭。這兩種人的數目比小自耕農多得多。此外，漢代人也間或利用奴隸從事農業勞動，但數目很有限；奴隸在當時多用作僕役洒掃之事，用來從事於農工生產的很少，小自耕農與佃戶在農業勞動組織上本來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但從漢政府的賦稅看來，他們同是佃戶齊民，在法律上歸於同一地位完全相等。所不同者，只是小自耕農是直接向政府納田租，而佃戶是由地主代向政府納田租罷了。現在讓我們先以這般佔農民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爲主，簡單地他們的經濟生活

要得到軍國的交通效率，紀律和組織，我們也當自改革。我們在上圖已經指出，軍與士代表的是三種不同的精神，士代表與軍充其種各，其精神優劣，我們如與從這河觀點來批評軍情，或許可以作進一步的瞭解現狀。

我們不願諱言之漢人的幼學。無軍人之紀律，我們亦看到如果切想學得二者之一，必須從改革漢代士的精神着手。

我們曾且假設這般小自耕農，在漢初五十年平均每戶爲一百畝。若據紀元後二年時記載，漢帝國總面積八、二、〇、五三六頃，人民有一二、二、三三、〇〇〇戶。平均每戶有田六十八畝不足。但此這種戶籍的記載，其性質與內容極其複雜，不能爲一般土地分配的根據，大約小自耕農的田畝平均每戶有幾畝多。再從其他零散的記載來估計，實以一百畝左右爲較合理。按西漢時的田價，武帝時京都長安附近田畝之價最廉，每畝僅銀一萬餘錢，以武帝以後官銀五銖錢爲單位，這是極特殊的，周圍附近田價則僅有一千五百錢左右。大概說來普通的農田每畝約值一兩半錢，齊時或不足半錢，漢以當時俗話說「中人之產」是半金，那就算是上等田畝。

關於漢時農田生產量的記載記載極其混亂。當時農產物北方以麥爲主，江淮以米爲最貴。據漢初人說，每畝農田的產量約一石至一石半。產量所以如此的低。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農業技術的粗陋。雲南雲南的農業技術較封建時代有長足的進步，但此也近代農業還差得很遠。當時只有農業最發達的南北一帶輪種與深耕已漸普遍，江南以及邊遠所在仍行農田休耕，甚至於火耕水耨。犁的發明與耕牛的使用因爲時代較近，尚未十分普遍，有些地方仍用人力或只用耒耜。鐵製農具形體較小，深耕仍不普遍，田中噴畦也很疏，灌溉與施肥的技術，對於時節土壤與農作物的知識，都是比較幼稚。不過火耨說起來，農業技術比戰國初年是進步多了。迨至漢武帝末年，大農業改革家趙過出來，借政府的力以求改革農具和耕耨耨苗的方法，推廣中耕及新的耨草法，改良人犁的功用，又發明了「二畝三畝農代田」的代田法，於是

中及中國一帶農業技術乃又進一步，「用力少而得利多」。據說經過這次改革，農產品的產量增加到每畝兩三石。到了兩漢末年，又發明了區田法（即點種法），這種方法可使產量更豐；但因太費勞力，直到魏晉仍未通行。總之，除了農業技術上的改良，一般農田的產量確較以前增加了不少。我們若假定每畝產糧平均在二石以上，那麼一百畝農田每年至少可以有二百石的出產。按兩漢的糧價，平均豐稔時每石三十錢，平均大穰五十錢。東漢末生活極其痛苦，豐年五十錢，平年七十至八十錢。米與麥的比價大致是八比五或五比三，豆比麥又賤約五分之一。我們假設以每石糧食平均可售五十錢計算，則一百畝農田每年的出產約值一萬個錢，這是一戶小自耕農從他的農田上二年所能收穫的一個大數的數目。這個估計無疑地是很粗率的。

這個數目如果以當時貨幣的購買力來衡量，其實很低。在漢時一個比較可吃的飯要十五個錢，一匹帛約一千錢，一頭羊二千錢，一只棺木二千錢，一個奴隸約一萬五千以上，一匹馬約五萬錢。所以一戶人家一年的收入只有一萬個錢，簡直不是個大數目。因此農家除種田以外，不得不從事於農村的副業生產。

在討論他們的別種生產以前，讓我們先看看他們的負擔。一般農民對於國家負擔主要的有兩項，一是賦役，一是賦稅。

漢時承襲及秦代的傳統，對於力役與兵役的觀念分得不甚清楚，統稱之為賦役。依照漢代的法律，男子成年以後，即得向政府登記，叫作「傅」。開始應服役，開始應役的年齡，在漢初或許是在二十歲以下；到景帝時正式定規為二十歲，武昭之世又推到了二十三歲。這二十三歲開始服役的制度直到漢末沒有改變。二十歲或二十三歲在官府登記以後，第一種義務叫作「更卒」。就是人民轮流替換着到本郡縣長官那裏去服役。依漢初舊章，更卒是每隔幾年出帥一次，一次的期限是五個月。後來在文景時代改定新章為每年一次，每次服役期限是一個月。農民事更卒之役，自己親身出帥去服役，叫作「更」；自己不願去的可以用錢三百雇人代勞，這種辦法叫作「過更」。更卒的更卒到了縣裏那裏，即由縣的尉官主管，所以地方官大可上下其手。和他們有交情的便可以派不到頭上，但不管出力服役或出錢過更，凡是農民，在法律上，每人每年總逃不了這種義務。自始應服役起，直到五十六歲為止，這種力役義務大概是本郡縣長官所當差，和從事本地方七木等役事公

共事業，有時還作一些地方警備的事宜。有時被調作「大縣役」。例如修築，築壘，修堤，築路，造橋，清發運糧，營築帝陵等大工程，這些事都相當勞苦。更卒以外那第二種義務叫作「正卒」。農民到了法定的服役年齡，在官府登記以後，就得先作更卒。正卒的服務一共兩年，一年到京師去作衛士。一年是在本郡縣當兵。縣都較遠的人，應這種正卒之役是很麻煩的，得自己籌筆整頓。縫補衣被，找差長隨去過京服役。勤身之前親戚故舊常常大家出錢來資助路費。到了京師之後，一部分輪流於京師諸官府，一部分去衛守京都附近的關陵；另一部分編為國家的衛士。武帝以前分編為兩北軍。武帝以後但入南軍。這種中央軍「歲時講肄，修武備」，習射擊，每年立秋有一次大檢閱。不過他們的職務只是護衛京師，很少被遣出去打仗。他們在京師的期間，衣食都由官府供給。一年期滿後，就回本郡縣再當兵一年，地方警備兵。這一年完全是軍事訓練，要學習射擊騎射，每年秋收以後，八九月間，郡太守都對他們一同招集到一郡首縣，集合起來「郡試」一下，以高下賞罰。漢光武帝以後，罷了郡縣試制度，因此地方正卒的軍事訓練也就廢弛了。在地方作正卒一年期滿，還鄉為農。國家無事時作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國家有戰爭時是受被徵發的。徵發到了頭上，凡不滿九十六歲的男子都不能抗拒命令。自武帝以後雖然募兵制度已起，但大部分的軍隊仍是徵兵。所以農民在漢代實是國家軍隊的中堅。這種徵兵制度直到東漢末才因政治的紛亂而消滅了。第三種義務的義務是「戍邊」，也稱「戍戍」，就是到邊疆上去「守衛乘塞」。從事邊防事宜。戍邊的责任是全郡農民都有的。漢代法律規定每人一生之中必得去戍邊一年；邊防若趨緊急時，還得繼續留守六個月。戍邊這種義務是最苦的一種（這由當時記載戍邊屯戍的情形處，可以看出來），因此有許多人不願意去，有錢的也可以依照法律來出錢雇人代替。這筆錢不知多少，但由一個月過更錢是三百來推計，每年至少總得三四千錢。這個數目是普通小自耕農家所不易擔負的，於是不得已便只好親身去戍戍。以上所述漢代這種賦役制度，原則上本來是普及於全體農民的但漢代的法律是不平等的，宗室貴族及高級官吏定可以免役，大資之家大地主則以金錢的勢力來出資買爵買「復」來免役；普通農民除了皇帝所勸特關恤以外，却是絕對不能避免的。

賦役以外，農民的經濟負擔還有賦稅，其中主要的有田租、算賦（口賦）

更賦四種。在戰國時代田租率通常是十分之一，這是當時一般政治家認為最合理的公平租率。不過列國因為戰時所引起財政上的困難，有時高到十分之二三，甚至「秦半」。秦半田租率向來是很高的，統以後漢宋未滅絕。漢高帝在大風之後為安民生民會減輕到什五而稅一，但推行並不徹底，旋復改為什一之稅。文帝時代是重農思想的全盛期，在這種思想下，政府訂定了三十而稅一的租率（元前二五）自此以後直至漢末，大體上沒有變動，就是武帝時財政上那種困難，政府只在他處籌劃，並沒有想到增加田租，漢時定租的方法是出政府估計農田的瘠沃，可能的產量，分為等次，然後按照畝租租，不管年成的豐歉納租則全部以按數，不用貨幣；即使種的是他種農產物，田租則仍以穀粒交納。到了後漢才間或用布帛代穀納租。這三十而稅一的租率，影響代田租比較起來算得很輕的。政府只以為穀租可以富民，却未想到他種收入要是一處個錢的話，這筆田租不過只合到三百三十錢個錢。與田租有些附帶關係的，是人民還得向政府納一種「稿稅」。稿即是禾稈，農民每年收成之後，法定得把一部分禾稈納給政府以養官家的牛馬。此稅大約可以拿錢代替，推想稅額一定很低。

算賦是人頭稅，也是秦代傳下來的一種制度，每個農民，不論男女，年總從十五歲直到五十六歲每人每年需向政府交納二百二十個錢的人頭稅，這叫做「算」。這筆算賦的賦額也有時因為特殊的原因減少或增加，但大體上總以一百二十錢為標準從漢初以來，政府鼓勵人口的繁殖，訂定了一條法律，說女子年十五以上到三十不出嫁的，每隔三年增加一算。譬如十八歲仍未嫁，則算一，三十歲仍未嫁，五算。這種法律促成了早婚制的普遍。又漢政府為了壓抑商人限制多蓄奴婢，自漢初以來就規定「買人奴婢倍算」，王莽時為要解放奴婢一時把奴婢的算賦增高到三十倍。算賦的交納用貨幣，很少准許以穀物折納的。納賦的時候在八月地方政府每年八月有一次「算比」。一方面要驗戶口製造戶籍，一方面便收納算賦。我們假設漢代小自耕農平均一乘五口，至少有三八納算，這筆稅每年是三百六十錢。第三種賦稅，口賦也稱口錢，口賦也是一種人頭稅，加在幼童身上的。自漢初以來法定十五歲以下的幼童（不知幾歲開始），無論男女，每口每年須向政府交納二十個錢。武帝時年給改定為自三歲至十四歲，每口年納二十三錢，元

帝時把年齡改定為自三歲至十四歲，漢末武帝時甚至要兒童牛馬。按此種賦稅未改。武帝以來所納的錢，別另納作附加的「馬口錢」，專門作為官家養馬的費用，漢末民生凋敝，有些貧苦的農家為了出不起口賦，竟至「多不舉產」。我們假設小自耕農五口之家有二入需納口賦，便是四十六個錢。

第四種「更賦」是由更卒之役而來。我們上面說過，一般農民有不願目己出頭去應更卒之役的可以自動出錢三百，交與官府雇人代勞。這種辦法叫作「過更」。有時官家因為事少，用不於多少更卒，官家便只叫人民出錢，性近強迫，這可以說是被動的過更，所出的錢大約和自動時的額數差不多。不管是自動還是被動，大約農民誰都討厭這種「一年一兩個月的服役，所以但能出錢都出錢來過更，於是這筆三百錢的過更錢，無形中便漸漸從人民自動出資以代更之勞的性質變成了與口賦算賦類似的一種擔負，後來便宜呼此錢曰「更賦」，額數大約即以三百錢為準。這種變遷還在漢中葉已經完成。漢初更卒之役，因為勞力工作有殘疾的當至可以免却，但自從漢中葉更賦之後，便「體廢成出」了。我們假設小自耕農五口之家每年得兩個男丁交納更賦，這筆更賦大約是六百個錢。

以上所說的四種賦稅是一般農民對政府最主要的經濟負擔。除此以外，尚有一種比較不甚重要的新稅。例如自武帝以後規定的畜稅，凡農家養的畜者以市價估計，值百抽二。後來許多人反對，以為這種「租及六畜」的辦法太苛，大約武帝以後便取消了。再如園稅，凡農家規模較大的菜園果園，都由政府估價值徵稅。政府大約最重視果園，漢末江南橋園，每一千株橋園「歲上一匹絹」。推想一般小自耕農沒有大規模的果園菜園，恐怕根本便沒有園稅；即便有，其稅額也是極其輕微的。

綜上所述，若但以主要的四種賦稅而論，總合起來，粗略的計算，每個農戶對於政府的賦稅負擔，僅當於他全年農田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四，即便人口增加，納賦增高，以人口之求中論也不過百分之二十。按漢時六次戶口調查，平均每戶都只有四五口所以大體說起來，漢代農民對政府的賦稅負擔並不算重。 (未完待續)

語言學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性

王了一

本週清華所提出的留學科目、原「語言學 (Philology) 一門，現在據說是被取消了。我們對此想說幾句話。

Philology 一名字普通的意義就是「語言學」和「Linguistics」相混。但著說語言學上的術語而論前者乃是偏於歷史上的考據，尤其是對於古代某一作家的文字一背景及其所含的教育意義等，作精確的研究。趙元任先生曾把它譯為「歷史學」，其實有點像漢代五經博士的學問。後者乃是對於歷史和世界上的一般語言事實，作普通的研究。依我們的推測，清華當局所提出的題目乃是就普通的意義而言，不是就語言學上說會話而言。但清華提用時，把它譯為「文字學」，也許引起政府方面的誤會，我們希望以後，關於「普通語言學」或「歷史語言學」一律用 *General Linguistics* 以避免兩可的意義。

中國公費留學生之有「語言學」一門，似乎始於民國廿四年。留美公費招過一次普通語言學，一次印歐語言學；留英公費招過一次印歐語言學，在兩兩三年之間，可以說是政府提倡語言學不遺餘力。一般人從此纔知道這「一門學問，政府「開風氣」的功績已不小。但語言學到底還算一種科學的學問，一般人還不大明瞭它的內容，尤其是不知道它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性。我們建此博覽一談，似乎不算多餘的。

語言學的身價價值不待言。政府之不肯再招這一門，並不是因為它沒有價值，是認為它並非當務之急。我們如果不從功利方面立論，這篇文字就失掉它的意義，所以本文所要討論的只有兩點，就是語言學對於外國語教學的功用和它對於科學的功用。

現在我們大學裏的「外國語」，算是很重要的課程了，但是教外國語的教師，往往是在研究西洋文學的人來充數。西洋文學的研究者在外國語文系裏，是更重要的，但他們所教的應該是西洋文學史和文學專家研究之類，而外國語的教學法兩方面，應該讓語言學者來擔任。咱們知道，西洋文學很有根據的人，他的外國語程度儘可以是很低的。即使發音正確，也不能根據語言學的原理來指導學生的發音。至於語法方面也是如此：一個對於外國文下筆千言而毫無錯誤的西洋文學專家，未必對於西洋語法的教學能勝任愉快。他

們都是在外國「十年磨下」。和外國的語言習慣融匯化於無形自然用不著走語法一捷徑。可惜咱們的大學生在中國語言環境裏學習外國語，所謂「一傳衆」，就非使他們徹底明瞭中西語法的異同不為功。除了外國語文系的學生之外，其他各院系都不必希望學生能寫得與雅的外國文，或懂得很深的西洋文學。因此假使咱們叫受過語言學訓練的人去教外國語，一定事半功倍。而且他們和西洋文學者是相得益彰的，不是互相妨礙的。例如大學裏若有一流「語源學」一門，則對於英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可予以不少的助力。

因為我是中國語文系的人，我願就此撇開語言學對於外國語教學的功用，轉到它對於科學的功用上。

我們常常覺得，派學生到外國學文法學科，結果往往是把他們養成一個較好的翻譯家，他並不是在外國研究中國的東西，只是因為他們回國以後，覺得把西洋的東西長此研究下去，很難超過西洋人（並非中國人的才力不如西洋人，只是中國的環境不適宜於西洋的學問），於是轉到國學上頭。他們在治學上得到了科學方法，所以他們的成績往往超過一般老學究或老學究的弟子。他們在中國的環境裏，在資料的應用上又勝於西洋的漢學家。說派文法科的留學生到外國學文法學科，似乎比派一般俗之論而事實上確曾得到過這種結果。現在國內第一流的中國哲學家、中國史學家、以至中國語言學家之類，多半是留學生。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也可以有新的「小學家」，如政府肯繼續地提倡語言學的話。

中國「小學」的現狀是怎麼樣的。趁此一談，一般人說音韻之學玄妙，說文字之學「一應酬」一對轉「一勞轉」，「一應之轉」來證明一種很靠不住的學說。靠著自己熟讀了一部說文，藉着任何方言的一個俗字都向說文裏去找它的老祖宗。這真是就正派的「小學」而論；至於自以爲新的文字學家所新的學說就更令人啼笑皆非。有人說要新的學說和中國的「君」字同源又有從史字音義皆近的字去發見人類創造語言的自然原則一在這種錯誤的基礎上，用盡了畢生的精力也是徒勞的。

也還沒有。說文一類的書，其可寶貴之處在於「好」不存於「好」。廢棄字典的錯誤且不必說，它的體例就麻煩的。晚出的幾種字典和辭書，除了新名詞外，其餘可抄，大致可用之外，仍舊以一字釋一字的辦法。它們仍舊是「治經」而作的字典，見於先秦書籍的字，無不存；近代產生的字義則雖常用者亦多遺漏。現代中國青年有幾個「治經」的？何以不集他們寫一部一般入通用的現代字典？即以「治經」而論，「治經」與否完無礙？甲字典說：「往、之也」；乙字典說「往、去也」其實凡其細心讀先秦古書的人，都知道「往」「之」「去」這三個字在先還是三種各不相同的詞。康熙字典為古書，近來各大書店印出一部字典或辭書，幾十個學者，費一年以上的工夫而成績之不濟人意，這就因為缺乏方法。甲字典有說：「治經」我們在本報第三期上說過，中國一般語法書，其缺點只有一「普通語言學」可以矯正，因為它能使我們知道世界上除了這語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語言。他們的語法各異其語不同，連英語的祖宗，近如盎格魯撒克爾語，遠如印歐語，也和英語不同。世界一寬自然不甘心說一個民族的來得。又使我們知道語法只是一種習慣，其中並沒有「天運」的存在，自然不

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

職業間的人口流動，有平面的與上下的兩種形式。農民進入工廠，變成勞工，或作或放下毛雞，加入政界，可謂屬於前者；佃農購得土地變成地主，或官商失業下野變為平民，則屬於後者，這中種種形式的人口流動，無論古今中外的社會，都存在着。

一個社會，在進程中，職業間的人口流動，分外來得顯著，目前中國，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後方農民的流入工廠，舊手工業師徒的多數改業，都已經成爲抗戰以來普遍的現象。造成職業間的人口流動的原因，原有多數；但其中工業化所引，較爲顯著。本文目的，即在就「平面的」流動，略加

至於要由事實來觀察，但到這了。

我們對於抗戰建國，沒有必勝必成的信念，否則我們應該料想到中國語文有興盛的一日。那時節，誰不一定像英語一般而走列人類的中學，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學裏也會有中語的一科，和英語的語法並重。那時節，咱們有沒有像牛津字典一樣好的中國字典給人家看？有沒有像萊斯伯家或利爾的英語語法一樣好的中國語法給人家看？

我們並不是說這是一兩個學生出洋留學的事，將來他們歸國就一定會負起這重大的使命。但是，政府提倡的效力於很大的；上有好之者，其下必有甚焉者，將來一定有人能學咱們的願望。

中國語言學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最近教育部雖把中國語文系分爲語言文學兩組，但實際上已設語言組者，據說只有四川聯大的一校（根據目的益世報）。將來如果每一個大學的中國語文系都設立語言組，咱們可以想像到需要多少語言文學方面的教師。中央研究院方面，因爲研究員的興趣關係，偏重於調查方言，以致有人誤會，以爲所謂語言學就是調查方言。我們希望將來中國語言學界人才濟濟，分工合作把中國語言學範圍內的各部門都弄出好的成績。但我們的希望政府的提倡容易實現的，不知道政府當局能不能採納我們的意見。



中國是所謂「五千年的農業古國」。當前她正遇到空前的危機，空前的威脅，也是空前的變局。中國的開始工業化，雖可追溯到開治年間；但以工業作爲建國的基礎，還是這次抗戰以後的事。在戰前，有時國內人士，還發生「重農」或「重工」的爭論；但到抗戰以後，問題的中心已轉由「重農」而轉變爲如何「工業化」了。於是朝野上下都一致努力於工業的建設，在廣大後方，如四川，雲南，西康等地，前後建立了十五個新工業區。在川滇黔三省中，戰時新建立的工廠，依民二十九年統計，資本以二十萬元爲最低額者，共計四七二家，西南本是一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若沒有這次

排，新工業在西南的發展，也許是近十年來所夢想不出的。

抗戰促成了中國由農業古國走向工業化的新國家，這一轉變，傳統的農業社會發生劇烈的解組。單就傳統職業方面而言，就已帶有急轉直下的局面。

試先以英美工業先進國家為例：英國的工業化的情形，在一八〇一年，農業人口，還佔總人口百分之三三·三；到一九一一年，只佔百分之十二；農業人口，降到幾乎無足輕重的地步。美國也是如此：在一八九〇年，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四·六，此後逐漸下降，至一九三〇年僅剩有百分之二四·六。可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要促使大量的農業人口，從事改革。

據我們在昆明市調查職業組織的結果，發現「改行」者甚多。例如：在四五年前，被調查本市共有三四十家，現則僅剩六七家了。其中有一二家，雖說最近以歇業、另謀出路。職前從事紙業業的，約有二十餘家。現在則只剩三四家，還朝不保夕。職前做香料業的家數：約在四十以上；而現在還在繼續營業的，不過十餘家而已。小木業的「手藝人」也顯然是不及從前多了，諸如此類的情形，正在方興未艾這是什麼原因呢？據他們說：「開門歇業」或「改行」，是由於「這行這道不行時，加以警報多，生活又昂貴」；「這話，雖沒有直接說出他們「改行」的理由，但這裏實在已經包含了他們不得不「改行」的苦衷。

「警報多」，確乎是戰爭的影響。戰爭不但破壞了許多「行道」，還使從前繁榮的店舖變成了「門可羅雀」。在昆明市，我們固然看見許多「店舖」被炸光了；這些被炸的人們，有的不得不另謀「高就」，有的則只好「開門歇業」，還有行行業，雖未被炸，亦受到同樣的打擊。被炸業便是一例，原來論書畫畫，那是承平時代的玩藝，值此「兵馬倥傯，軍書倥傯」之際，誰還能有此閒情逸致？類似的這些「行業」，恐怕只有「開門」或「改行」，這是他們最後的一着。

昆明市許多行業的手藝人的改行，戰爭固是一因，最主要的還是地方工業化的影響。譬如小木業的師傅，很多往附近的工廠去了。他們所說「行道不行時」一話，最能說出他們的衷曲；「不行時」三字，最有分析價值。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有些「行道」，當然不能新興的事業，因而勢必失

。有新事業的發展，即在舊事業中沒落。這是生產過程上常見現象，無庸多說。

工業化對舊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所以它給與社會的影響，也總感到整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目前，在昆明市，有許多傳統的「行業」，都在逐漸地對落，沒落，關門，以至於別謀出路。這是工業化必然結果，無足深怪。所以工業化的過程，不但是農村人口大量的「離地」，也是市鎮中傳統職業人口大量的「改行」。

在工業建設當中，新事業的急遽增加，是需要大量勞力的。這些工人有的來自農村，有的則來自市鎮中的舊職業，已如前述。這沒有一個問題：即新事業能吸收傳統職業多少人口？換言之亦即是傳統職業能供給新事業多少人口？這是在職業人口流動中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新事業能吸收傳統職業多少人口呢？這裏沒有可靠的數字可資徵引。不能，新工業的吸力，可自其對傳統職業組織的破壞的程度，得到一個說明。其理由如下：
倘如新事業吸收傳統職業的程度甚大，則傳統職業裏的手藝人，便失去謀生的機會。於是不得不從舊職業中跳出，流向新興的工業。反之，若新工業化而傳統職業的程度很小，則傳統職業仍舊有拉住大量人口的力量；那加上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與不願輕易拋棄祖傳「行業」的心理。那麼，從農業到工業間的人口流動，也許要延長期限了。

新工業的發展，與舊事業的關係，具有密切的關係。新工業如不能吸收的傳統職業的職業，必將感受勞力的缺乏。因為這時新舊事業，都在需要人力。結果必演成新舊事業相互「挖人」的現象，舊事業既不安定，新事業亦不穩固。所以「衝破」二字，是新工業發展條件之一。

目前中國正處在新舊事業交替的過程中，其情形如何呢？就農村：「農民離地」是戰前熟習的名詞，而且被一般人認為是農村經濟的象徵。這名詞在目前應是值得慶賀的。但是事實上，除去大批壯丁被徵發從事抗戰的神聖任務外，「農民離地」，却是並不開闊。
在西南各工廠中，雖然容納大批離地的農民，試一分析這些農民離地的根本原因，很多還不是由於新工業吸引所致。據費孝通先生在一四兩工業的人力基礎——文中所述：女工入廠的原因，可以說近百分之八十由於家庭

舊工廠作工的人，也還有相當的數目。這些人暫時進入新興事業，但工廠無法長久留住他們。由此可見中國新工業的進步，是比較慢的。

就市鎮中傳統行業方面說，在以前，改行營業者極多。但是，改行的手藝人，只有少數流入工廠，大多數流到其它傳統職業（如人力車夫、商店）裏面去。這一種情況，對於工業化可謂毫無影響。這說明人口流動現象，並不能及早加以修正。將來會對新工業的建設發生很大的不利影響。

其次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也許是很多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恐怕是出於目前地方所建設的工業，並非如十八九世紀英法初建工業局的程序漸進；却與帝俄彼得大帝提倡工業時有些相似，係一種急驟而進的局勢。帝俄還在平時，中國則在戰時。所以許多問題也就由此發生了。

高度現代化的工業，其所需的工人，須有專門的技術。當不能改行的師傅所能勝任的。這種改行的手藝人，到工廠只能作小工。他們覺得地位太低，收入太少，不勝仰事俯畜的困難。但技工的地位呢？對他們又顯高不可攀。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不能在祖傳行業裏專身的人，祇好別謀生計了。這即是新事業，還沒有力量吸收傳統職業裏人口的原因。

目前尚無的技術訓練，工業化不啻將傳統行業的程度不啻大減。這有許多其它事業，直接和工業「撞入」。例如兵役，就是最顯明的一例。因此，反映在新工業建設上的，便是處處需要大批勞工，却處處難見找得到勞工的呼聲。結果造成了「事浮於人」的狀態。就是「待聘如僧」，還是供不應求。

四、

舊工業既無力擴張事業，結果必使舊業或它舊行業與工業間的人口流動延遲的很久。此種過程的延長，使我們看來是害多利少的。其原因可自人口流動給社會的影響上加以說明。職業間人口流動，本來是隨時隨地都存在的。對於社會不致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日前川流不息式的人口流動，却是一個反常的現象。可以約略地敘述如下。

就利的一面說；由於人口的大流動，致使就業的機會增加，可以產生社會「假窮」的悲劇，就業者在流動的過程中，眼界擴大，

獲得的知識一類的與經驗。這是很好的。

至於害的一面，則比較具體而且顯而易見了。第一，目前，凡是「過渡期」的地方，就業者莫不如似蟻附羶，衆大如雲，隨之隨處落後。就知識份子方面說，也復如此。目前大學畢業生之流入銀行者，多則出入意外地進步，但加入學術機關者却區區數百。此中原因，據說係由于學術機關與銀行待遇，相差懸殊所致。可見待遇的厚薄，可以決定人口流動的方向了。各類職業為所欲大的吸收人口，便不得不提高薪給作「誘人」的條件。但人的慾望無窮，而待遇的提高，却有限度的限制。因之極易養成就業者的「五日京兆」，與「得龍定獨」的心理。譬如許多改行的手藝人，多半是向收入最豐富的那方面流動。據傳說某被棄業的老板，改行經營，其主要的動機是由於目前經濟，最易發財，又如某銀行一職員，月入在四百元以上，結果認爲不足，而加入那批走私之流的隊伍。這些雖是傳說，却不難見「惟利是圖」的心理在職業人口中，是頗為流行的。

其次，就業者對於職業，沒有持久的恒心，也是當前流動中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就業容易，打破「飯碗」算不了一件大事。所以就業者的因循敷衍，不肯努力作事，甚至無用取鬧藉故與管理人員與爭吵等，都變成了一種「見慣」的現象。

復次，就業者的節奏甚楚，捨熟就生，勢必浪費工作時間，降低生產效率。對技工對工廠，兩無裨益。

最後，就業者因流動過速，每天都和陌生人接觸，彼此間的同情心極易喪失；因之對於服務社會秩序的習慣也極易流弱。在昆市，許多外來的勞工，與司機等，據說在他們間性病的流傳，頗為普遍。這件事實，表示外來勞工的社會生活，已經脫離了常軌。因為外來勞工多是單身的。他們離鄉背井，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既無家庭的維繫，又無親友的監督，社會對於他們的幾乎全然失去約束的力量。於是他們便任性放浪，毫無顧忌。性病的流傳就成了必然的結果。這有一種由虎山虎的走私措施，也是由於這種觀念低落所發生的不良現象。

上述四點：不啻是毒藥大劑，其它害處還多，恕不一一細舉。即此四端

，對於社會的損失，是相當的嚴重。所以，我們必須注意，以免社會不合理的損失，委實是當前的急務。

五、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其間所引起職業間的人口流動，本是一件冗繁的，不易迅速結束的事情。工業化的歷史，早有先例。美國用了約四十年的時間從事工業化，才把農業人口由百分之六四，六減到百分之二四、六，德國也費了四十年的工夫，把農業人口，由百分之四二減到百分之三十。德國工業化，雖是比較迅速的，但每十年只減少人口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二十，也費了十年的努力，纔有現在的成績。返觀我國，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要把這樣一個龐大的人口，而工業化，其間所引起的人口流動，當然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完成的。那是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其職業間人口的流動，也許比歐美各國的年限更要拉長了。

本期撰者

賀麟，邵德昌，王了一，三先生俱任職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賀先生是哲學教授，張先生是經濟史教授，王先生是語言學教授。

本屆清鄉委員會考試名額，文法兩科設有副院長決定副院長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文學四門。我們對這種輕視文法的傾向，不能表示贊同的。因此在最近三期中我們先後發表了張金鑾、馮友蘭、及王了一先生的文章，他們從專家的立場說明法學、哲學、和文字學的用處。本來我們還有一文論政治學的意義，但因篇幅所限，只能割愛了。

本刊啟事

本刊近因紙價漲價費用增加，自十四期起，零售每本四角。訂閱半年八元，全年十四元，優待學生，六折計算。

本刊啟事

本刊訂戶增加，後期第一二三期及甚多。如有願期愛者請向本刊社或昆明各經售書店均代辦。

本刊啟事

本市訂閱者請向昆明山陽路雲南文化服務社接洽。

當代評論

每星期一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當代評論社

昆明西南聯大收禮館

印刷者

中央日報

代售者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每份四角 訂閱半年八元 全年十四元 (或折成美金四元)